

Confused World and Buddhist Community: Textual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u, Chao Hsien Relief Account (AD. 547)

Cheng-yu Tu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ast, the academic circle used to regard Buddhist “Yi-Society”, a religious form organized by a group of people, as an organization arranged by monasteries or landlords for preying on populace, or just a civil religious propagation unit, but now, the Tu, Chao Hsien Relief Account (AD. 547) could overturn these opinions. Yang Chai Yi-Society was actually related to military, and Ching Chao Tus guarded there because of the upheaval of Hou, Ching. When the army of Eastern Wei assaulted Yang Chai, the Tus organized Yi-Society and fought back without surrender.

If we check the Relief’s lists,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 South was the leading officials, the North represented the Tus who fought in the neighborhood areas, the East symbolized the Tus who took office in the Western Wei, and the West was the residents of Yang Chai. For cohering the Tus and the inhabitants, Yi-Society could strength not only the identification of local community, clan, or region, but also the concept of a nation. As a

result, Yang Chai Yi-Society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civil, and it was actually related to the authorities.



Key Words: Buddhist Yi-Society, Relief Inscription, Northern Dynasties, Aristocratic Family

亂世與義邑： 西魏大統十三年〈杜照賢造像記〉考釋

杜正宇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

摘 要

過去學界多認為佛教義邑是寺院、地主剝削群眾的組織，或僅代表鄉村與民間的傳教活動。不過，西魏大統十三年的〈杜照賢造像記〉，卻是一個官方主導的例證。陽翟佛邑的組成以軍人為主，而京兆杜氏鎮守於此，又是緣於侯景之亂。在東魏舉兵來犯之際，西魏守軍面對著孤軍受圍的情勢，不但結成義邑，更展現出既無外援，亦無叛者的信念。

觀〈杜照賢造像記〉四面組織，南面為當地軍官；北面為因分兵而散處前線的杜氏宗族；東面為在內地任官的杜氏宗族；西面則疑以當地居民為主。可見佛教義邑就是將京兆杜氏與當地人們，納入同一群體的方法。陽翟義邑不但具有官方色彩，有助於建立共同體意識，甚至國家認同。

關鍵字：佛教義邑、石刻造像、北朝、侯景之亂、世族

一、前言

佛教義邑的形成與造像活動的發展，可謂是佛教傳布中，相輔相成的兩大環節。根據寧可的看法，由於戰國以來的里社制度，在漢末遭遇了戰亂流離與門閥世族侵佔人口的威脅，使國家里制蕩然無存，導致了私社的形成。而私社之中，最為盛行的就是「東晉末南北朝時隨佛教流行由信徒組成的『邑義』…邑義主要流行於黃河流域，一般按村邑或宗族組成，在僧人參加或指導下，結集人眾，聚斂財物，從事造像、修寺、建塔、營齋、誦經等活動…實際上是寺院地主與世俗地主藉助佛教統治，剝削群眾的組織」。¹

上述的說法，據寧可自述，是綜合了日人山崎宏、那波利貞、竺沙雅章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作為學界的代表。不過，此說值得商榷。第一，有些義邑是由遷調至地方的官員或遊化僧侶所發起，能否構成地主階級藉佛教剝削群眾的說法，令人質疑。如大統三年（AD.537）之〈白實等造中興寺像記〉中的佛邑倡建者——白實就是從河北轉調南陽的官員，他和當地的地緣關係並不深刻，算不上世俗地主。²而周行鄉里的僧侶，如普安所推動的義邑，則是基於對「不殺生」、「不血祀」觀念的倡導，他的身分也離寺院地主過遠：

（普）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雞豬絕嗣，乃至於今。³

普安的弘道作為，除了推廣佛邑組織，更在村邑間行俠仗義，救濟貧苦，這些都和寧可所謂透過佛教統治，剝削群眾的行為無關。而普安

¹ 寧可，〈述社邑〉，《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1985），頁13。

² 魯迅，《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二三，（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頁515。

³ 《續高僧傳》，卷27〈普安傳〉，頁682。

於齋會之中，以緣化粟米救助貧苦，更是鄉人對其崇敬的原因。

此外，文中的「法義」即義邑的別稱。劉淑芬認為「義邑」亦稱為「法義」或「法儀」。如山東高柳村《法義造像記》中，俗人成員皆稱為「法義」。⁴中正大學歷史系顏尚文教授，則以中央研究院、北京圖書館等地收藏了數以千計的造像拓片資料為研究基礎，認為北朝義邑的同義詞大約有法義、法儀、義邑、邑、合邑、都邑、邑儀、邑義等八種。⁵而中國大陸學者郝春文亦根據上述對普安的記載，認為「邑（造像邑）、邑義和法義等是東晉南北朝時期十分流行的由僧尼與在家佛教信徒混合組成或僅由在家佛教信徒組成，多數以造像活動為中心的佛教團體」。⁶可見學界的確視「法義」為義邑的別稱。

此外，或許是義邑的出土地點失佚，不似官方組成的義邑，留有大量官銜，可考證地點；導致學者們多將佛教義邑視為民間或鄉村的產物。如劉淑芬也認為義邑與佛教的傳播「有促進鄉村社會整合的作用，顯現在村落之內不同姓族的連結，村落與村落之間的聯繫，以及縮小社會差距三個方面」。⁷不過，根據本文對造像活動的理解，許多的佛教義邑，亦存在於通都大邑或塢堡之中。如天和六年（AD.571）以費氏姓族為主體組成的佛邑——〈費氏造像記〉，據孫星衍的《寰宇訪碑錄》記載，即出於長安。⁸而天和六年（AD.571）

⁴ 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3 卷，第 3 期(1993)，頁 523-524。

⁵ 顏尚文，〈北朝佛教社區共同體的法華邑組織與活動——以東魏李氏合邑造像碑為例〉，《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1 期(1996)，頁 171。

⁶ 郝春文，〈從衝突到兼容——中古時期傳統社邑與佛教的關係〉，《普門學報》，第 24 期(2004)，頁 8；郝春文，〈東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結社〉，《歷史研究》，第 1 期(1992)，頁 90-105。

⁷ 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史語所集刊》第 63 卷，第 3 期(1993)，頁 536。

⁸ 碑文收錄於王昶，〈費氏造像記〉，《金石萃編》卷 37，頁 25-29；地點考校於孫

的〈扶杖榮造像記〉所記載的佛邑，則出於北朝的軍事塢堡——龍頭堡。⁹可見義邑並非皆在村落。甚至，也有義邑由軍人組成，如天和五年（AD.570）的新豐佛邑——〈普屯康造像記〉，籌建組織雖然得力於當地的豪強薛氏，但組織義邑的原因，仍然來自他們的統帥——帥都督普屯康的善願。¹⁰

可見過去對義邑的認識，似仍留有後人補充的空間。那麼，究竟佛教義邑的作用為何？其組織成員與建立地點是否可進一步考證？於是，本文以西魏大統十三年（AD.547）的〈杜照賢造像記〉為例，進行考校，以補充學界過去對義邑的看法。

二、〈杜照賢造像記〉的時空背景

北朝的世族，由於身處亂世，大多擁有一定的武裝。尤其關隴地區，在納入了府兵的範圍以後，許多世家名門，也紛紛率領由宗族組成的隊伍，參與了作戰遠戍的任務。河南地區也留下了京兆杜氏的遠征紀錄——西魏大統十三年（AD.547）十一月十五日的〈杜照賢造像記〉（圖1）：

夫大聖雖邇，遺影□顯。自非建福崇因，刊石記功，河乃流名後代，□勉三塗者哉。是日都邑主杜照賢、維□杜慧進等十三人，各竭家資，敬造石像一尊。願三寶永隆、國祚康泰。

又為師僧、父母、回緣眷屬，普及法界眾生，等同正覺。
大魏大統十三季歲在丁卯十一月甲午十五日戊申造□。

星衍，《寰宇訪碑錄》，卷2，頁25。

⁹ 《聞喜縣志》，卷20下〈新增金石〉，頁7-8。

¹⁰ 〈普屯康造像記〉，《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二五，（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頁985。

本是雍州京兆人，因官在此。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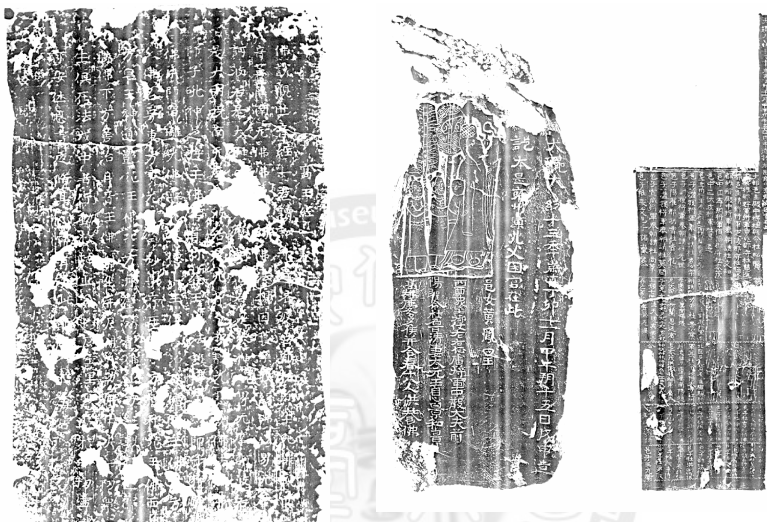


圖 1 〈杜照賢造像記〉。引自《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 6 冊，頁 16-18。

根據《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對引文的附記，石刻出土於今日的河南禹縣。而禹縣於其時，則為東魏所置的陽翟郡。¹²此地位於洛陽東南方的潁水流域，向來是東魏重臣——河南大行臺侯景的根據地。而侯景在東魏，是僅亞於高歡的權臣：

¹¹ 〈杜照賢造像記〉，《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 6 冊，（河南，中州古籍，1989），頁 15-18。

¹² 雖然譚其驤主編，〈東魏〉，《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台北：曉圓，1991），頁 61-62，因圖版過小，未能見載。但翻檢同書，則北魏的〈司、豫、荆、洛等州〉：頁 46-47；與第五冊，隋代的〈河南諸部〉，頁 5-6。都可確認禹縣，即為當日的陽翟。而陽翟在東魏時，設置為郡。參見魏徵，《隋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卷 30 〈地理志中〉，頁 837。

(侯景) …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為司徒、南道行臺，擁眾十萬，專制河南。¹³

侯景鎮守河南之地約十四年，高歡對他頗有戒心。如高歡在死前一年，曾告訴世子：

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¹⁴

而河南則在形勢上與河東相對，屬於西魏國境東南的突出地帶，位處三國之交。宇文政權在此設置荆、浙、洛、襄等州，¹⁵尤以荊州最為兵家必爭之地。早在西魏試圖控制本區以前，高歡即有意經略，以弭腹心之禍：

荊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¹⁶

而兩魏相爭，為了牽制敵方，也多用兵於此。如大統三年（AD.537）的沙苑之役，主戰場雖於沙苑、弘農等地，但高歡、宇文泰亦分別遣軍趨荆，以開拓第二戰場。主要原因即由於荊州——主要指南陽——地近兩京，可為東西交通樞紐。不但有驛道自南陽，延丹水河谷西北直線連接，由藍田入關中，以接長安；亦可順此路線，由上洛轉向東北，即可順洛水谷地，直抵洛陽。¹⁷可見具有箝制兩京的重要地位。而南陽東北的魯關，更是經略敵境潁、汝二水流域的必經之地。其目標往往是陽翟，以及潁水上游，可由後背進襲洛陽的潁川。形成魯關——陽翟——潁川，這條足可行軍的交通要道。而這種紛擾的局勢，直到大統十三年（AD.547），侯景先降西魏，再奔南梁以後，宇文政

¹³ 姚思廉，《梁書》卷56〈侯景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834。

¹⁴ 李百藥，《北齊書》卷2〈神武紀下〉，（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23。

¹⁵ 謝啓昆，《西魏書》卷8〈地域考〉，（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70-74。

¹⁶ 李百藥，《北齊書》卷2〈神武本紀〉，（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14。

¹⁷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卷3，（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5），頁801-811。

權才算初步取得了河南的控制權：

(大統十三年)正月…齊神武薨。其子澄嗣，是為文襄帝。與其河南大行臺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來附…三月，太祖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景請留收輯河南，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秋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太祖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¹⁸

可見西魏能於大統十三年(AD.547)取得河南之地，並派軍駐紮，確實是緣於侯景的內附事件。而同年京兆杜氏杜照賢等眾的移陣河南陽翟，亦應是緣於侯景事件。至於杜照賢等人的來路，如上引文，則有二種可能，第一，跟隨李弼由關隴出兵，而留置陽翟。第二，跟隨王思政由荊州東征，而駐防陽翟。以隨李弼出征而言，由於侯景久任敵方統帥，「少習兵權，情時難測」。¹⁹當他來附時，宇文泰如臨大敵。不但從關隴地區糾集軍隊：「會侯景舉河南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征(宇文導)為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²⁰更以李弼節度徵召而來的諸軍，東進河南：「太祖遣弼率軍援景，諸將咸受弼節度。弼至，軌退。王思政又進據潁川，弼乃引還」。²¹因此，杜照賢等人也可能於大統十三年(AD.547)年初由關隴隨李弼出征，而駐守陽翟。不過，題記中有部分人士，特意標示其郡望為荊州南陽。因此，隨李弼自關隴出征的可能性，比隨王思政由荊州東征的可能性較低。

¹⁸ 令狐德棻，《周書》卷2〈文帝紀下〉，(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30-31。

¹⁹ 令狐德棻，《周書》卷15〈于謹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247。

²⁰ 令狐德棻，《周書》卷10〈邵惠公顥附子導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155。

²¹ 令狐德棻，《周書》卷15〈李弼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240。

本文認為，京兆杜氏比較合理的來路，是伴隨王思政東征，因而駐防陽翟。理由有三：第一，依照王思政的經歷：

(大統初) …轉驃騎將軍。令募精兵，從獨孤信取洛陽…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復令思政鎮弘農…十二年，加特進、荊州刺史…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²²

可見王思政於大統初年，曾奉宇文泰之命募集精兵，以隨獨孤信東取洛陽。而當時的西魏，由於版圖限於關隴一帶。因此，募兵之地，應當就是首要的關中地區。王思政的部屬韋孝寬則出身於京兆韋氏：「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²³。因此，既然京兆韋氏能夠成為王思政軍隊的來源；那麼，王以募兵而兼領京兆杜氏的部眾，自然有其可能。

第二，王思政由荊州開赴河南，雖具有與李弼換防的意義。但帶去的軍隊並不多。且分別留置隊伍，駐防重要城鎮：

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²⁴

根據上引文可見王思政所率領的荊州軍隊，在到達目的地之後，明顯減少了兩千餘人。而陽翟位居潁川後衛，不但是大軍過境之處，

²² 令狐德棻，《周書》卷 18〈王思政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295。

²³ 令狐德棻，《周書》卷 18〈韋孝寬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535。

²⁴ 令狐德棻，《周書》卷 18〈王思政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295-297。

更是歷來駐防的重鎮。西魏用兵河南，向來以陽翟爲屯兵之所。如《周書》之〈宇文貴傳〉：「東魏潁州刺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其驍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眾二萬攻潁。(宇文)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而西魏軍抵達陽翟之後，立即召開軍事會議。宇文貴分析道：「吾今屯兵陽翟，便是入其數內」。可見陽翟與潁川之間的形勢關聯。²⁵根據上述《周書》之〈文帝紀下〉、〈李弼傳〉與〈王思政傳〉等記載，當王思政進軍魯關、陽翟(杜照賢所在地)、潁川之後，李弼即領軍還。如杜照賢是跟隨李弼前來，至七月時應已返國，如何能在十一月於陽翟建立義邑？而王思政率領之荊州萬餘部隊，入河南後分布諸軍，主力八千人前進潁川。餘眾兩千餘即爲「分布諸軍」。按此記述，可見杜照賢等眾之駐守陽翟，亦應是緣於王思政「分布諸軍」的舉措。

第三，藉由題記的署名，我們可以發現至少有兩位杜姓人士與荊州南陽女子通婚。一是杜景業之妻爲南陽張氏、一是杜平蠻之妻爲南陽趙氏。而具名的邑女，也有南陽張房憐、南陽趙汝勝等，特地在她們的姓名前，標示其出身爲荊州的南陽。²⁶可見，本題記之題名錄中，有男性標其郡望爲京兆杜氏，亦有女性標爲荊州南陽。爲何陽翟義邑中會出現荊州婦女？若配合上述《周書》之〈王思政傳〉中，王思政曾於關隴募軍，之後屯駐荊州(任荊州刺史)，並自荊州率軍前來河南之記載，或可解釋荊州婦女出現於陽翟的情形。因此，根據上述三個理由，本文以爲，陽翟義邑中京兆杜氏與南陽邑女的來路，以王思政所率領荊州軍隊，其可能性最大。

不過，當他們抵達河南以後，所面臨的局勢，卻絕非王思政「因

²⁵ 令狐德棻，《周書》卷 19〈宇文貴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312。

²⁶ 南陽郡於當日隸屬荊州。參見謝啓昆，《西魏書》卷 8〈地域考〉，(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70。

機進取」，伺機經略的單純。侯景的舉棋不定、東魏的節相侵逼，均牽動了河南局勢。反觀西魏，一則兵力不足，整體戰略上顯露出只能守，無可攻的弱勢。僅僅萬餘的部眾，實在難以完成監視侯景動向；再者孤軍深入，以致危機四伏。如繼承高歡政權的高澄，在寫給侯景的書信中慫恿他：

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
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即相加授，永保疆場。²⁷

侯景在面臨「見誣兩端，受疑二國」的情勢下，²⁸遂於大統十三年（AD.547）七月再叛西魏。此後周行河南，直到受到了東魏慕容紹宗的追擊，才於十二月，潰散奔梁。²⁹而佛邑造訖的時間即在十一月間，可見當時的時空背景，是如何的熙攘不安。

此後，由於河南地屬東魏要害，具有「西、南合從，方為己患」，³⁰牽涉三國情勢的戰略意義。因此，在逐出侯景勢力後，高澄傾國之兵來犯。大統十四年（AD.548）九月，東魏慕容紹宗十萬大軍來攻潁川：

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
十萬來攻潁川。³¹

除了派出慕容紹宗等軍團圍城，他更親率主力十一萬增援：

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督勵士卒…城北面

²⁷ 李百藥，《北齊書》卷3〈文襄紀〉，（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33。

²⁸ 李百藥，《北齊書》卷3〈文襄紀〉，（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35。侯景寫予高澄的復書。

²⁹ 侯景入梁的時間在當年十二月。僅有姚思廉，《梁書》卷56〈侯景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840，留下了記載。

³⁰ 姚思廉，《梁書》卷56〈侯景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835。

³¹ 令狐德棻，《周書》卷18〈王思政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296。

遂崩。³²

這股龐大的攻勢，直到王思政敗降，河南復歸東魏以後，才停頓下來。而終西魏之世，宇文泰也再未能取得河南寸土之地。在此連番戰事下，陽翟位於南陽、潁川之間，是敵後道路的重要據點。這種交通分佈的特色，除了因道路的往來，有助於佛教傳布的擴散。³³或許也由於前線的駐軍，位於敵我軍隊行軍、征戰所必經之處，不但飽受戰亂之苦，特別需要宗教的撫慰；在疆界隨戰事變遷的情況下，掌握軍民的國家認同，也是官方主導佛邑的主要目的。而佛邑的興造地點——陽翟，自大統十五年（AD.549）春，慕容紹宗掘洧水以後：

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之。³⁴

此地已與國內阻絕：

太祖遣大將軍趙貴…監督東南諸州兵以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皆為陂澤，救兵不得至。³⁵

不過，即使面對著孤軍受圍的情勢，西魏的將士仍然展現了「既無外援，亦無叛者」的忠誠信念。³⁶印證到杜照賢等人的身上，能夠支持他們國家認同的原因，想必就是題記中刻意強調的「本是雍州京兆人、因官在此」的地緣光環裏，所展現的鄉黨、宗族關係的牽引。此題記魯迅亦有傳抄，他將「本是雍州京兆人、因官在此」文句，

³² 令狐德棻，《周書》卷 18〈王思政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296。

³³ 顏尚文，〈後漢三國西晉時代佛教寺院之分布〉，《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13 期（1985），頁 36。

³⁴ 李百藥，《北齊書》卷 20〈慕容紹宗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 274。

³⁵ 令狐德棻，《周書》卷 2〈文帝本紀〉，（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31。

³⁶ 令狐德棻，《周書》卷 18〈王思政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297。

記在北面題名後方。³⁷不過《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³⁸則將題記載錄爲〈杜照賢等造像記〉、〈杜魯清等造像記〉（即佛邑的西面組織）兩篇。而「本是雍州京兆人」等語，則兩篇皆有出現。一在杜照賢題名前，另一在杜魯清題名前。可見「雍州京兆人」，並非單指杜照賢而已，實爲佛邑中，所有杜氏宗族所強調的共同郡望。

三、〈杜照賢造像記〉的組織成員與代表意義

佛教義邑的組成人物，除僧侶外，大抵有五個系統。一是“出資者”如「都像主」、「像主」等，二是“勸化者”如「勸化主」、「化主」等，三是“管理者”如「都邑主」、「邑主」等，四爲“掌理庶務者”如「都維那」、「維那」等。五爲參與義邑，但未有邑職的人士。如「邑子」、「邑女」等。其邑職的職司以王昶的解讀較早，頗具代表性：

凡出資造像者曰像主、副像主、東西南北四面像主、發心主…都大檀越、都像主、齋主…勸化者曰化主、教化主…邑中助緣者曰邑主、大都邑主、都邑主…其寺職之稱曰和上、比邱、比邱尼、都維那、維那、典錄、典坐。

39

雖然王昶在各種邑職的解讀上，存有不少的誤解與未釐清的問題，比如「邑主」不爲助緣，而爲管理者。「檀越」則意爲“施主”，應爲助緣者。而「都維那」、「維那」、「典錄」、「典坐」等則是借用寺職之

³⁷ 〈杜照賢等造像記〉，《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二三，（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頁 545-550。

³⁸ 北圖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河南，中州古籍，1989），第 6 冊，頁 15-18。

³⁹ 王昶，〈附北朝造像諸碑總論〉，《金石萃編》卷 39，頁 18。

銜，而行邑中諸事。但其說法，仍大致呈現了主要的邑職系統。⁴⁰而捐資系統的「像主」與管理系統的「邑主」，顯然是佛邑中的靈魂人物。許多碑文的刻寫，不但以此二者居先，而後世對題記的命名，亦多借用像、邑主的姓名。如北周武成二年（AD.560）以像主王妙暉領銜的義邑，即稱為〈王妙暉造像記〉。⁴¹又如北齊武平元年（AD.570）修造的〈董洪達造像銘〉，⁴²則藉大都邑主董洪達姓名為題。可見「像主」或「邑主」於佛邑的主導地位。

此外，學者劉淑芬曾指出，當時的造像模式裏，另有「道場主」，並推論道場主應「和提供舉行齋會、儀式的場所有關」。⁴³本文則以為，「道場主」印證了《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⁴⁴中，造像與道場結合的模式。但「道場主」不多見於石刻記載的原因，可能有二：（一）道場是安放佛像的地方。因此，造佛像在立道場以前。所以當佛像完成之日，眾人姓名窩刻石碑，自然少了「道場主」之名。（二）道場也是舉行齋會儀式的地方。在義邑組織中，多有「齋主」邑職，和打理齋會所需事項相關。因此，也可能因處理齋會問題而兼具「道場主」的性質。至於佛塔，則造型多變，有單層和多層。最多為七級，即所謂七級浮屠。佛塔大多是用磚石砌成，亦有用巨石鑿製而成。劉淑芬認為冠有「塔主」頭銜者，可能是認捐建造佛塔的贊助人士。⁴⁵但邑職之中，仍有少數迄今仍不明其具體內容，如「邑中正」便是。山崎

⁴⁰ 杜正宇，〈西魏北周時期的佛教發展〉，《普門學報》，第 58 期(2010)，頁 55。

⁴¹ 王昶，《金石萃編》卷 36，頁 1-5。

⁴² 王昶，《金石萃編》卷 34，頁 19-24。

⁴³ 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史語所集刊》，第 63 卷，第 3 期(1993)，頁 525。

⁴⁴ 耶舍堀多，《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冊 20，1070 經，頁 150。

⁴⁵ 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史語所集刊》，第 63 卷，第 3 期(1993)，頁 525。

宏於〈隋唐時代江義邑及法社〉中認為，邑中正係借用魏晉南北朝時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官之名，邑正乃邑中正之略稱。史書中雖然沒有邑里中正之記載，但造像記所見的邑中正應是義邑行政方面的職稱。不過，劉淑芬認為，由於沒有其他線索可資追尋，邑正或邑中正在義邑中扮演的角色不詳。⁴⁶

而〈杜照賢造像記〉中，佛邑的領導階層，依照題記，指的是「都邑主杜照賢、維□(那)杜慧進等十三人」。可見應該是當時居於陽翟，而在佛邑中擔任邑職的人士。題名中，至少有十二人具備了這類身分特性，分別是邑主系統四人：大都邑主杜照賢（官員）、都邑主杜猛略（官員）、都邑主杜文□（平民）、邑主杜慶遵（平民）、維那系統四人：大都維那杜慧進（官員）、都維那杜文和（官員）、都維那杜英寯（平民）、維那杜慶□（平民）、邑中正系統四人：杜零茂（官員）、杜景遵（官員）、杜容徽（平民）、杜遺國（平民）。可見每種邑職四人，官民各半，充份展現出氏族和諧的象徵。而各種邑職的領導者，都由官員出任，也說明了官方主導的事實。

至於第十三位領導者，本文推論應為前陽翟令杜魯清。由於他的熱心善業，不但在佛邑中捐資成為大齋主與西面像主；檢之西面題名的組織結構，除杜魯清為唯一的官員外，其餘的邑職、邑子、邑女全為平民。可見他在佛邑中，不但地位頗高，也是官民溝通的主要管道。加上又為佛邑主導者杜照賢的前任縣官。因此，杜魯清應該就是邑職以外的第十三位領導者。佛邑的官員階層，則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當朝京兆杜氏的居官情形（表1）：

⁴⁶ 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史語所集刊》，第63卷，第3期（1993），頁525。

表 1：陽翟佛邑的官員階層

僧官			比丘黃臺縣沙門都僧衍
後面 (南面)	邑職	管理 法會	大都呂主殿中將軍杜縣照賢、都呂主積野將軍□陵郡守杜猛略 大都維那大齋主冠軍將軍京兆郡守杜慧進、都維那殿中將軍奉朝 請杜文和
		不明	邑中正寧朔將軍□陽郡守杜零茂、邑中正伏波將軍杜景遵
	邑子		寧朔將軍奉車都慰南□縣開國男杜元龜、陽翟郡功曹杜貴□
			蕩寇將軍奉朝請杜惠宗、蕩寇將軍奉朝請杜莫問
			討寇將軍奉朝請杜光世大齋主、宣威將軍奉朝請杜尙革
北面	邑職	佈施	上堪象主討寇將軍奉朝請郡功曹杜景業（妻南陽張） 多寶象主龍驤將軍長社令汝陽太守江州刺史杜平蠻（妻南陽趙）
	邑子		平南將軍□州刺史杜皇奴、鎮西將軍箱州刺史杜王國
東面	邑職	佈施	象主假龍驤將軍資□□軍杜文緯、塔主城局參軍杜□（生
	邑子		開國侯杜景宗、河東郡功曹杜夫扶、平南將軍洪驢少卿杜顏奴
			寧遠將軍京兆太守杜□陵、鎮遠將軍穎川太守杜毛陵、
西面	邑職	佈施 法會	象主大齋主御仗左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前陽翟令杜魯清（妻太原王） *（其餘邑職、邑子、邑女皆為平民）

題名分列四面。其中一處，魯迅抄做「後面」。⁴⁷根據當時普遍出現的四面像碑，配合題名分屬東、南、西、北四方的情況看來，⁴⁸題名的「後面」應該就是「南面」。而南面組織，即為官員邑職的核心。

⁴⁷ 〈杜照賢等造像記〉，《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二三，（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頁 548。

⁴⁸ 如保定四年(AD.564)的〈聖母寺四面像碑〉，即將題名分載四方。參見王昶，《金石萃編》，卷 36，頁 19-26。

前述的佛邑官方主導者，皆分布於其中。除杜照賢外，共出現了三位郡守、七位將領以及一位郡功曹。這十二位官員，皆加將軍戎號，可見其軍事團體的性質。此外，三位郡守中，除兩郡名，殘缺難辨，另外一位京兆郡守杜慧進，則與東面組織的京兆太守杜□陵，官銜重複。不過，杜慧進擔任大都維那邑職，具有管理佛邑平日事務的職責。或許應身居陽翟。而當日已有調令，但以戰事緊繃，未曾到任而已。

北面組織，則有官員四位。性質上分屬捐資系統的像主以及具銜的邑子，可見實際參與佛邑運作的程度並不深。在地緣方面，兩位像主皆納南陽女子為妻，也顯示出他們與荊州地區的密切關聯。至於三位刺史，除了一位屬地不詳外。江州汝陽郡（其人兼汝陽太守）位於潁川東南的潁水流域，⁴⁹地近東魏與南梁的國界，其西南方就是侯景駐軍的豫州，實為王思政軍團的南方前線。「箱州」，西魏無置，或者為「襄州」之錯體，而襄州地在河南，下轄襄城等郡，位於魯關與陽翟之間的汝水流域。⁵⁰具有保障王思政潁川左翼的效果。由此可知，則這些北面官員，應該就是原鎮荊州，而隨王思政東來「分布諸軍」，因而散處河南的杜氏宗族。

東面組織，則有官員七人。除了捐資系統的像主官銜殘缺，以及開國侯杜景宗等二人，未具備地緣評判根據。其餘五人，都可作為帝國四方任職的杜氏象徵。京兆太守杜□陵已如前述，位居關中內地。潁川太守杜毛陵則處於陽翟東方的王思政本營。平南將軍洪驢少卿杜顏奴，其中「洪驢」或為「鴻驢」，乃當時六少卿之一，⁵¹其任官地點

⁴⁹ 譚其驤主編，〈東魏〉，《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台北：曉圓，1991），頁 61-62。

⁵⁰ 襄州下轄襄城、南安等郡。參見謝啓昆，《西魏書》卷 8〈地域考〉，（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71。不過，譚其驤主編，〈東魏〉，《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台北：曉圓，1991），頁 61-62，因圖版過小，未能見載。可參照同書，北魏的〈司、豫、荆、洛等州〉，頁 46-47。

⁵¹ 魏收，《魏書》卷 113〈官氏志〉，（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2996。

則在京師。而當時以文職加軍銜的情況普遍，因此不能以陽翟眾軍視之。如以博學詞彩著名的學者盧誕：

太祖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⁵²

此外，武將以軍職而兼行政職的情形，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如土豪出身的北雍州刺史毛遐，就「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⁵³固城大都督白實的官銜則為「大魏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前河北太守鎮固城大都督周城縣開國男」。⁵⁴白實的鎮遠將軍，官秩正四品下，⁵⁵為當時中上階層的軍官。而步軍校尉，則為從四品下的散職。實際上，散官不理事，為假章綬、賜班位而已。北魏以後，皆以將軍而兼散職，形成常制：「欲收軍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⁵⁶至於大都督，其職責為領導及組織地方鄉兵。根據日人濱口重國的研究，大統十一年以後，為了利於招募軍隊，大都督多「挑選當地號稱首望或鄉望的豪強」出任。⁵⁷此外，駐防於關中的新豐縣令普屯康，其官職為「中軍將軍師都督新豐縣令」。⁵⁸其中，中軍將軍為從八命戎號。⁵⁹「師」都督則為「帥」都督之錯體。⁶⁰戎秩正七命，介於大都督與都督之間，可說是軍方的中層

⁵² 令狐德棻，《周書》卷 46〈盧誕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807。

⁵³ 毛遐《周書》未載，今採李延壽，《北史》卷 49〈毛遐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 1808。

⁵⁴ 魯迅，《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二三，（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頁 515。

⁵⁵ 魏收，《魏書》卷 113〈官氏志〉，（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2996。

⁵⁶ 王仲榮，《北周六典》（台北：華世出版社，1982），頁 581。

⁵⁷ 濱口重國，〈西魏時期的二十四軍與儀同府〉，《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四，（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200。

⁵⁸ 魯迅，《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二五，（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頁 985。

⁵⁹ 王仲榮，《北周六典》（台北：華世出版社，1982），頁 597。

⁶⁰ 歷來學者多以「師」作「帥」。毛漢光，〈西魏府兵史論〉，《中國中古政治史論》

將領。至於他所兼領的新豐縣令一職，應與其負責統帥新豐地區的軍隊有很大的關係。這和白實的情況非常相似。不過，武將以軍職而兼行政職，其行政職多為地方之太守、刺史、縣令等。此與中央文官加授軍職的情況並不相同。

另一位河東郡功曹杜夫扶，官居河東地區的秦州。⁶¹城局參軍則是宇文泰的大丞相府署官員，⁶²可見東面人士分處四方的特性。特別的是，東面組織乃唯一沒有平民參與的區域，或許就在於這些民眾居處陽翟的特性，因此刻意迴避，以突顯此面作為陽翟以外各地杜氏宗親的象徵意義。

西面組織，則與南面對，是平民邑職的核心。不但佛邑的平民領導者，皆處其中，也容納了絕大多數的平民邑子女。已卸任縣令的杜魯清，或許即因與他們相處較久，因而同列西面。至於，佛邑的僧民階層，則如表 2：

表 2：陽翟佛邑的僧民階層

僧侶		比丘黃臺縣沙門都僧衍、比丘道邸
平民	邑職	管理 都邑主杜文□、邑主杜慶遵、都維那杜英病、維那杜慶□
		不明 呂忠（中）正杜容徽、忠（中）正杜遺國
		捐資 東面像主杜尚華(仰為亡父雍州主簿別駕咸陽太守奉朝請輕車將軍給事中雍州中正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杜洪暢)、供養主杜光世
	邑子	杜 24、邵 1、林 1、陳 1、張 1、王 1、褚 1
	邑女	黃 2、張 1、尹 1、新興秦 1、南陽張 1、南陽趙 1、倪 1、李 1

（台北：聯經出版社，1990），頁 212。

⁶¹ 河東郡地在山西，屬秦州二郡之一。謝啓昆，《西魏書》卷 8〈地域考〉，（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68。

⁶² 王仲羣，《北周六典》卷 1〈大丞相〉，（台北：華世出版社，1982），頁 24。

以上共有僧侶二人。其中沙門都，是北魏以來僧官副職——都維那的簡稱，⁶³可見僧衍並非一般的遊化僧。黃臺縣則位於潁川郡內，⁶⁴由於潁川鄰近佛學傳教中心——洛陽。元魏以來，不但積聚了四座寺院，向來亦屬傳教較廣的地區，⁶⁵只不過北魏時期，陽翟仍屬潁川，而這四座廟宇，即有一半位於當地。換句話說，杜造賢等人根本不須要捨近求遠，以求邑僧。除非是和僧衍的僧官身份有關。

以當日情勢而言，無論杜照賢或者王思政，他們開赴河南的原因，都是爲了軍事守禦。理論上，是不可能有西魏沙門隨軍的，沙門隨軍甚至從軍的情形，除非像北齊在面臨亡國之禍時，其信都守將「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爲戰士者，亦數千人」。⁶⁶不過那是特殊情形。至少王思政軍中不見此類記載。此外，荊州佛教的起步很晚，即使想要派出僧侶，也有困難。根據學者對寺院的統計，南陽介於南方的江陵與襄陽兩大傳教中心之間，佛教傳布雖然深受南方影響。但建寺的記錄僅有一處，不算是寺所林立之地。⁶⁷況且，南陽的佛教事業，除了寺院很少，義理傳布也不普遍。以致出身宗氏的高僧亡名，必須南下蜀境修習佛法。⁶⁸因此，陽翟佛邑所能借重的，只有原屬東魏的僧侶。而京兆杜氏世爲高望，在選擇僧人的層次上，良莠不齊的遊化僧或寺僧，當然是不受歡迎的。所以，只能邀請附近在政治立場上倒向西魏的官僧。然而，能夠具備這種條件的比丘不多，或許僧衍就是其中大者。不過，即便如此，在組織嚴謹的佛邑中，仍然未設邑

⁶³ 謝重光，〈北魏、東魏、北齊的僧官制度〉，《北朝研究》第3期(1990)，頁74。

⁶⁴ 黃臺縣爲東魏所置，在潁川郡內。魏收，《魏書》卷30〈地理志中〉，(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838。

⁶⁵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7)，頁68、87。

⁶⁶ 令狐德棻，《周書》卷12〈齊瘍王憲〉，(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193。

⁶⁷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7)，頁62-64。

⁶⁸ 道宣，《續高僧傳》卷7〈亡名傳〉，頁481-482。

師，可能就出於「成王敗寇」的心態，不願意接受附降者的指導。

但是，若以僧衍受人敬重的僧官身份，且是受到杜照賢等「邀請」而來襄助造像供養的活動，理當領銜在前，而不是和比丘道邸一起名列前後都是邑子的俗家信徒中。因此，本文亦無法排除僧衍和道邸，乃是基於信仰而自發性地參與造像供養活動的可能。至於兩位比丘的作用，除了護持義理的品質；可能也和號召當地居民參與有關。包括杜氏在內，部份的邑眾，都在姓氏之前，冠上了京兆、南陽、新興、脩（修）武、太元（原）等出身地。這種做法，似乎是刻意的突顯他們來自異鄉，象徵了人們的身分認同。因此，題名之中，未刻意冠上出身，亦非杜氏的異姓邑子、邑女十二人（邑子褚□□、林件祥、陳□□、張遵、王元□、邵法僧；邑女黃桃枝、張嘆房、尹小姪、倪勝光、李照堂、黃鳳皇），因其無任何官職與任何邑職，應屬平民階層，也未突顯異地之出身，或有可能為當地居民。他們之所以參與造邑，或許也來自前縣令杜魯清、僧衍、道邸等緣於鄰里與宗教情懷的感召。當然，他們的投入，也有可能出自本身的佛教信仰，以致於自發性的參與。可見邑眾雖仍有強調京兆、南陽、新興、脩（修）武、太元（原）等異地出身的作法，但佛邑的組成，至少是相互融合的契機。這也突顯出義邑拉近人群距離的特性。

而佛邑的性質，不但具有官方色彩，軍事將領、官員亦於邑中居重要地位，這與過去學界普遍將佛教義邑視為民間或鄉村的產物大不相同。由於本區直接承受來自東魏、北齊的軍事壓力，以致境多兵燹，屢有叛降之事。因此，義邑的設置，官方涉入的程度較高。這種官員的參與及控制模式，可謂是關隴政權於政教合一下的產物。由此可見，區域內的形勢、交通以及政軍情勢的發展，均影響了官方參與佛教組織的意願與層次。

四、〈杜照賢造像記〉與觀世音信仰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記〈杜照賢造像記〉，其拓片陰刻《高王觀世音經》，以正、篆、隸間書。根據牧田諦亮、桐谷征一、王惠民、李小榮、張總等學者之研究，⁶⁹《高王觀世音經》存世的最早版本就刊刻於〈杜照賢造像記〉。《高王觀世音經》為中國較早出現的疑偽經，亦稱《觀世音經》，內容大致屬於諸經摘抄。法琳《辨正論》卷 7、道世《法苑珠林》卷 14 及卷 17 均有記載。智升《開元釋教錄》卷 18、卷 20 則列為偽經。自〈杜照賢造像記〉以降，《高王觀世音經》傳抄不斷，如東魏武定八年杜英儁等十四人造像碑、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北齊造像碑、北京房山刻經（隋末第 5 洞、7 世紀的第 3 洞）。哥倫比亞大學藏初唐造像碑、龍門石窟 2 部。敦煌文獻（P.3920、俄敦 531 號）、吐魯番文獻、黑水城西夏漢文文獻 2 部（TK117 號、TK118 號）、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藏（F1914.56）、山西應縣木塔遼代寫經 2 部、美國新奧爾良博物館金代木雕菩薩像身中藏《高王觀世音經》2 部等。而「高王觀世音」最早載於史冊是在《魏書》之〈盧景裕傳〉中：

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辜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⁷⁰

⁶⁹ 牧田諦亮，《六朝古逸觀世音靈驗記の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1970 年）、桐谷征一，〈偽經高王經のテキストと信仰〉，《法華文化研究》，第 16 號（1990），頁 1-67、李小榮，〈高王觀世音經考析〉，《敦煌研究》，第 1 期（2003），頁 104-108、王惠民，〈高王觀世音經早期版本叙錄〉（敦煌研究院：<http://www.dha.ac.cn/03DE/index.htm>）、張總，〈觀世音高王經並應化像碑〉，《世界宗教文化》，第 3 期（2010）：<http://www.zwskw.com/bzqk/shekelishi/sjzjwh/2010/3/xsztzjyskg/3302.html>。

⁷⁰ 魏收，《魏書》卷 84〈盧景裕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頁 1859。

可見在杜照賢等人在刊刻《高王觀世音經》之前，已有高王觀世音之名。至於盧景裕至杜照賢之間的年代，是否已有《高王觀世音經》刊刻問世？因目前出土碑文，尙未有其它記錄，本文不敢斷定。但觀世音之名爲鳩摩羅什所譯，是北朝相當流行的佛教信仰之一，卻是個不爭的事實。此一信仰，約興起於西元 470 年後。在整個北朝的造像活動中，始終是一支穩定成長的信仰。⁷¹由於觀世音信仰，強調其神力可以解除一切煩惱病苦，因此廣受流傳。再加上高僧與佛典翻譯、講授的推動，其信仰更爲普遍。如蜀地的高僧慧遠即留下了「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等語，⁷²其盛況可見。

根據清代金石學者王昶的統計，北朝時期數量較多的造像爲觀世音、無量壽佛、釋迦與彌勒。⁷³而筆者收錄的西魏、北周時期題記中(187 篇)，⁷⁴雖多未註明所造的佛像種類；但在具體記載佛像類型的 48 篇題記中，造觀世音像者亦有 15 篇(表 3)。這 15 處觀世音造像中，成員的類型多元。有官員參與者，如〈杜照賢造像記〉、〈荔非興度造像記〉、〈董道生造像記〉、〈趙富洛等二十八人造像記〉；有僧侶造像者，如〈比丘逢道造像記〉、〈僧演造像記〉、〈僧顯等造像記〉、〈比丘明雋造觀世音像〉、〈比丘智□等造像記殘石〉；有平民造像者，如〈劉黑婆造像記〉、〈范慈造像記〉、〈薛迴顯造像記〉、〈王士真造像記〉、〈王爲亡夫造像記〉、〈白景造像記〉。其組成性質亦多元。有個人造像者，如〈比丘逢道造像記〉、〈劉黑婆造像記〉、〈范慈造像記〉、〈薛迴顯造像記〉、〈王爲亡夫造像記〉、〈比丘智□等造像記殘石〉、〈比丘明雋造

⁷¹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頁 111-113。

⁷² 道宣，《續高僧傳》，卷 28〈讀誦篇 8〉，頁 686。

⁷³ 王昶，《金石萃編》卷 39，頁 16。

⁷⁴ 杜正宇，《西魏北周時期具官方色彩的佛教義邑》(台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0)，頁 170-182。

觀世音像〉、〈白景造像記〉；有合家造像者，如〈董道生造像記〉、〈王士真造像記〉；有集團造像者，如〈僧演造像記〉、〈荔非興度造像記〉；有義邑造像者，如〈杜照賢造像記〉、〈趙富洛等二十八人造像記〉。其中，集團造像和義邑造像的區分，在於組織結構。集團造像不具備義邑組織，成員也沒有邑主、像主等邑職。至於兩處義邑，〈趙富洛等二十八人造像記〉為民間主導。而〈杜照賢造像記〉則如前述，為官方主導。

本文以為，15 處觀音造像中，在信仰的傳布上，以杜照賢等人的貢獻最大：(一)陽翟義邑的成員眾多，又多為官員，且聯繫分散四方的宗族，其影響力應較個人造像、合家造像，以及成員多侷限於造像之地的集團造像為大。(二)西魏、北周時期的造像亦有刊刻佛經的情況，如〈宗慈孫等三十七人造像記〉刊刻《法華經》、⁷⁵〈梁嗣鼎墓誌〉刊刻《涅槃經》、⁷⁶〈袁氏造不高佛殘像〉刊刻《三千諸佛名經》。⁷⁷佛經的刊刻，除了可達到使人親眼目睹、宣揚經文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石刻文字可以被拓印，更可達成經文傳播的目的。根據《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的記載，〈杜照賢造像記〉中的《高王觀世音經》為陰刻。而陰刻多用於文字，陽刻多用於紋飾，其目的就是便於拓碑。⁷⁸而陽翟位處交通要道，也有利於經文的傳布。當然，在缺乏史料的情況下，本文實無法判斷經文被拓印的次數有多頻繁，影響有多深遠。但至少陽翟義邑的《高王觀世音經》能夠留存至今，

⁷⁵ 〈宗慈孫等三十七人造像記〉，魯迅，《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二三，（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頁 559。

⁷⁶ 〈梁嗣鼎墓誌〉，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圖版 360〉，（台北：鼎文書局，1972），頁 34。

⁷⁷ 〈袁氏造不高佛殘像〉，端方，《匋齋臧石記》，卷 14，頁 9。

⁷⁸ 陳相仲，〈論雕版印刷術之發展因素及其影響〉，《科技博物》，第 9 卷，第 2 期（2005），頁 91-103；蘭小平，〈淺談古代碑刻的拓印技法〉，《文物世界》，第 2 期（2007），頁 73-75。

就是當年的刻石之功。

表 3：西魏、北周時期的觀世音造像記

序	名稱	年代	造像類型	出處
01	比丘逢道造像記	大統四年 5/03	敬造黃玉觀世音一區...	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頁288。
02	僧演造像記	大統四年 7/15	造觀世音菩薩法像...	王昶,《金石萃編》,卷32,頁13。
03	杜照賢等造像記	大統十三年 11/15	敬造石像一尊... (陰刻高王經)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6,頁15-18。
04	僧顯等造像記	廢帝元年 5/03	敬造玉石像觀世音一區	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頁295。
05	劉黑婆造像記	西魏時期 不知年代	敬造觀世音...	端方,《匋齋臧石記》,卷10,頁4。
06	荔非興度造像記	保定二年 ???	造觀世音一區...	《考古與文物》1994.2,頁48-49。
07	范慈造像記	保定二年 2/08	敬造觀世音像...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8,頁105。
08	董道生造像記	保定二年 4/08	敬造觀世音...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8,頁106。
09	薛迴顯造像記	天和三年 4/08	造觀世音佛像一區...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冊8,頁138。
10	王士真造像記	天和四年 7/23	敬造觀世音像一區...	王昶,《金石萃編》,卷37,頁15-16。
11	趙富洛等二十八人造像記	天和六年 4/15	敬造觀世音像一區...	端方,《匋齋臧石記》,卷14,頁4-6。
12	王爲亡夫造像記	建德元年 7/15	敬觀世音菩薩一丘...	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頁375。
13	比丘明雋造觀世音像	北周時期 不知年代	造觀世音佛一區...	端方,《匋齋臧石記》,卷14,頁8-9。
14	比丘智□等造像記	北周時期 不知年代	敬造觀世音像一區...	端方,《匋齋臧石記》,卷14,頁10。
15	白景造像記	北周時期 不知年代	白景造觀世音像一區...	端方,《匋齋臧石記》,卷14,頁10。

此外，除了《高王觀世音經》以外，西魏、北周時期另有一部由耶舍堀多所譯的《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相信亦對本期的造像活動起著重大的作用。此經說明根本神咒、咒水、咒衣、咒香、結界、行道等以及造十一面觀世音像法。可見佛經不但鼓勵造像，並已進一步的將佛像的規格、材質及形象定制化。至於造像的福報，則是藉此興佛誦經的功德，使眾信得到十種復四果報，⁷⁹可以消災解憂，遠離危難：

有能依觀世音教作法者，彼善男子善女人，須用白旃檀作觀世音像。其木要須精實，不得枯筴。身長一尺三寸作十一頭。當前三面作菩薩面，左廂三面作瞋面，右廂三面似菩薩面狗牙上出。後有一面作大笑面，頂上一面作佛面。面悉向前後著光，其十一面各戴花冠，其花冠中各有阿彌陀佛。觀世音左手把澡瓶，瓶口出蓮花，展其右手以串瓔珞施無畏手。其像身須刻出瓔珞莊嚴。⁸⁰

至於陽翟佛邑中，諸邑眾摘抄諸經，以致刊刻了疑偽經《高王觀世音經》的原因，本文以為這種對義理認識不清，甚至混淆的情況，其實是當時造像活動的特色之一，不足為奇。譬如，據《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彌勒下生的時間，至少在五十六億萬年後。可見要生值彌勒下生，參加在龍華樹下的三次法會(龍華三會)，以助渡眾生

⁷⁹ 十果報為「何等為十？一者身常無病。二者恒為十方諸佛憶念。三者一切財物衣服飲食，自然充足，恒無乏少。四者能破一切怨敵。五者能使一切眾生皆生慈心。六者一切蠱毒，一切熱病無能侵害。七者一切刀杖不能危害。八者一切水難不能漂溺。九者一切火難不得焚燒。十者不受一切橫死。」。除此，復可得四果報「一者臨命終時得見十方無量諸佛。二者永不墮地獄。三者不為一切禽獸所害。四者命終之後升無量壽國」。耶舍堀多，《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大正藏》冊 20，1070 經，頁 149。

⁸⁰ 耶舍堀多，《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大正藏》冊 20，1070 經，頁 150。

成佛的時機，實遙遙無期。⁸¹但許多信眾對此都有期待。紛紛在題記中，刊刻了彌勒信仰的「彌勒三會」、「龍華三會」、「生聞佛法」等文字，但他們所造的佛像卻非彌勒。這種情況在西魏、北周時期的造像記中亦不少(參見表 4)。如〈介媚光造像記〉造釋迦像、〈薛山俱造像記〉造觀世音與釋迦像，但這兩篇題記卻都出現了「彌勒三會」。而〈嚴萇造像記〉造無量壽佛像，題記卻出現了「龍華三會」。又如〈王瓮生造像記〉造無量壽佛像、〈王士真造像記〉造觀世音像，但題記卻出現了「生聞佛法」。此外，亦有造不知名佛像一尊，卻在題記中同時指涉阿彌陀佛（西方淨土）與彌勒信仰（一時成佛），混淆了阿彌陀佛與彌勒信仰的意涵。如〈邵道生造像記〉。

這種佛教信仰的“非系統性”，學者認為固然是民間「信仰層次低，對義理理解、掌握不深，肢解與歪曲了教義。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正是中土信徒創造性的體現。他們並不是海綿吸水般地簡單地全盤接受，而是經過自主的選擇來編織其信仰，表達其心願」。⁸²

表 4：西魏、北周四大造像題材與祈願文對比之經像混淆部分

題 記	時 間	造像種類						混淆的 祈願文	出 處
		觀 世 音	無 量 壽	釋 迦	彌 勒	石 像	像		
介媚光 造像記	大統十四年 4/03			1				彌勒三會、 願登初首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 拓本匯編》6冊，頁 19。
薛山俱 造像記	恭帝元年 4/12	1		1		1		彌勒三會、 願登初首	《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二三， 頁 563。
王瓮生 造像記	保定四年 12/15		1					生聞佛法	王昶，《金石萃編》，卷 36，頁 12。

⁸¹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頁 201-202。

⁸²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頁 102。

嚴萇 造像記	天和四年 1/23		1					生值龍華三會	端方，《匋齋臧石記》，卷 14， 頁 2-3。
王士真 造像記	天和四年 7/23	1						託生西方、 生聞佛法	王昶，《金石萃編》，卷 37，頁 15-16。
邵道生 造像記	建德元年 6/20						1	託生西方、 一時成佛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 卷 23，頁 21-22。
註：表中的像與石像，並未註明所造之神祉類型，故依照題記原文。而「石像」或指材質為石塊；「像」則因題記並未註明材質，本文無法臆測，亦僅能依原文之記載。									

五、結論

前人學者對佛邑整合社會的功能，多有闡發。除馬長壽先生提出佛邑有助「民族融合」的觀點。侯旭東論及義邑的影響時亦言：「佛教東來，深入民間…基於這種共同的信仰，村落內的信眾或相鄰村落的信眾結成社邑，共同從事佛教活動，強化了他們之間的聯繫。不同區域，不同背景的人們因共同的信仰，具有了相互聯繫的潛在的可能，利于整個社會共同精神生活的養成」。⁸³透過對陽翟義邑這個實際案例的研究，可知佛邑整合族群的影響，不僅僅於民族融合，或是扮演鄉里、村邑間的「膠著劑」。甚至在甫經佔領的地區，軍事將領們也設法運用佛邑的力量，試圖凝聚當地的居民。而京兆杜氏就在造邑的活動中，接納了當地群眾的參與。這對消泯彼此之間原屬兩國的對立，改善來自西魏的杜氏宗族與原籍東魏的陽翟居民之間的關係，非但多有裨益，並有助於建立和諧的秩序。而共同的宗教信仰，也不僅對「鄰人關係」的凝聚，起著重要的作用，亦是將四面八方的杜姓宗族與當地的陽翟居民，進一步納入同一群體的行動。影響所及，除了促成邊地人們的情感凝聚，也使宗族之間的關係，不至於因

⁸³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頁 271。

距離而疏遠。至於陽翟佛邑四面碑文的題名組合，與刻意強調「本是雍州京兆人」的出身，可知他們於異鄉組織佛邑的目的，亦為連絡分散四處的宗族及強化與當地居民的關係。這種透過義邑而聯繫眾人的模式，不但有益於彼此之間的認同，「共同體」的意識，甚至更進一步的提昇至政權認同層次。杜照賢等人，即使面臨著孤軍受圍的情勢，仍然堅持抵抗，充分展現了對國家的忠誠信念，能夠支持他們的理由，想必就是題記中所展現的鄉黨、宗族、國家等「共同體」認同的牽引。



參考書目

一、史料

1. 王昶，《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台北：新文豐，1977）。
2. 令狐德棻，《周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
3. 李百藥，《北齊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
4. 〈杜照賢造像記〉，收入北圖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6冊，第8冊（河南，中州古籍，1989）。
5. 〈杜照賢等造像記〉，收入魯迅，《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二三，（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
6. 耶舍堀多，《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大正新修大藏經》冊20，1070經，新文豐出版公司。
7. 姚思廉，《梁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
8. 端方，《匋齋臧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台北：新文豐，1977）。
9. 孫星衍，《寰宇訪碑錄》，《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台北：新文豐，1977）。
10. 魯迅，《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二五，（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頁985。
11. 《聞喜縣志》，《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台北：新文豐，1982）。
12. 慧皎等，《高僧傳合集》（上海：上海古籍，1995）。
13. 謝啓昆，《西魏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
14. 魏收，《魏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
15. 魏徵，《隋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新校本）。

二、學位論文

16. 杜正宇,《西魏北周時期具官方色彩的佛教義邑》(台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0)。

三、專書

17. 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東京:佛書刊行會圖像部,1915)。
18. 王仲犛,《北周六典》(台北:華世出版社,1982)。
19.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90)。
20. 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台北:弘文館,1985)。
21. 牧田諦亮,《六朝古逸觀世音靈驗記の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1970年)。
22. 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
23.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台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
24.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7)。
25. 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台北:鼎文書局,1972)。
26.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台北:曉園出版社,1991)。
27.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5)。

四、期刊論文

28. 王惠民,〈高王觀世音經早期版本叙录〉(敦煌研究院:
<http://www.dha.ac.cn/03DE/index.htm>)。
29. 杜正宇,〈西魏北周時期的佛教發展〉,《普門學報》,第 58 期(2010)。

30. 李小榮，〈高王觀世音經考析〉，《敦煌研究》，第 1 期（2003）。
31. 陝西省文物考察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考古與文物》，第 2 期（1994）。
32. 桐谷征一，〈偽經高王經のテキストと信仰〉，《法華文化研究》，第 16 號（1990）。
33. 郝春文，〈從衝突到兼容——中古時期傳統社邑與佛教的關係〉，《普門學報》，第 24 期（2004）。
34. 郝春文，〈東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結社〉，《歷史研究》，第 1 期（1992）。
35. 陳相仲，〈論雕版印刷術之發展因素及其影響〉，《科技博物》，第 9 卷，第 2 期（2005）。
36. 張總，〈觀世音高王經並應化像碑〉，《世界宗教文化》，第 3 期（2010）。
37. 寧可，〈述社邑〉，《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第 1 期（1985）。
38. 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史語所集刊》，第 63 卷，第 3 期（1993）。
39. 謝重光，〈北魏、東魏、北齊的僧官制度〉，《北朝研究》，第 3 期（1990.3）。
40. 顏尚文，〈後漢三國西晉時代佛教寺院之分布〉，《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13 期（1985）。
41. 蘭小平，〈淺談古代碑刻的拓印技法〉，《文物世界》，第 2 期（2007）。

附錄：杜造賢等造像記之題記內容

	杜造賢等造像記	大統十三年 11/15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6冊：15-18
題記	夫大聖雖遯、遺影□顯、自非建福崇因、刊石記功、河(疑爲“何”)乃流名後代、□勉三塗者哉、是日(疑爲“以”)都邑主杜照賢、維□(應爲“那”)杜慧進等十三人、各竭家資、敬造石像一尊、願三寶永隆、國祚康泰、又爲師僧、父母、回緣眷屬、普及法界眾生、等同正覺。大魏大統十三季、歲(應爲“歲”)在丁卯、十一月甲午、十五日戊申、造□(疑爲“迄”)、本是雍州京兆人、因官在此。		
題名	記後： 大都邑主殿中將軍杜縣照賢、大都維□(應爲“那”)冠軍將軍京兆郡守杜慧進、都吧(應爲“邑”)主積野將軍□(應爲“定”)陵郡守杜猛略、都維那殿中將軍奉朝請杜文和、中正寧□將軍奉朝請杜惠宗、邑子討寇將軍奉朝請杜光世、邑子陽翟郡功□(應爲“曹”)杜貴禮、邑子□寇將軍奉朝請杜莫問、邑子宣威將軍奉朝請杜尚莘、邑子杜長文、邑子褚□□ 北面： 北面上堪(應爲“龕”)象(應爲“像”)主討寇將軍奉朝請郡功□(應爲“曹”)杜景業、母脩(應爲“修”)武張、□(應爲“妻”)南陽張、兄伏國、弟阿蘭、息(應爲“媳”)延□(疑爲“賓”)、子□(疑爲“寬”)、女真妃、先妃、子妃、男妃、上顛(應爲“願”)七世生天、現在安吉存亡、蒙福普□、北面多寶象(應爲“像”)主□□(應爲“龍驤”)將軍杜令、汝陽太守江州□(應爲“刺”)史杜平□(應爲“蠻”)、□(應爲“妻”)南陽趙、息(應爲“媳”)零茂、洪徽、孫神崇、廣□(疑爲“先”)、神□(疑爲“悅”)、□(疑爲“叔”)林件祥、爲七世生天、現在□福、合門大小供養佛。邑子杜始和供養佛、邑子杜文雅供養佛、邑子杜季和侍佛、邑子杜仲賢侍佛、邑子杜令和侍佛、邑子杜樹生侍佛、比丘黃臺縣沙門都僧衍供養佛、比丘道邱供養佛、邑子杜貴龍供養佛、邑子杜洪壽供養、邑子陳□□侍、邑子張遵侍。邑子平南將軍□(疑爲“佛”)州□(應爲“刺”)史杜皇奴侍佛、邑子鎮西將軍箱(疑爲“襄”)州□史杜王國侍佛時、邑子杜敬祖、邑子□焦、邑子杜元明侍、邑子邵法僧、邑子杜洪□(疑爲“惠”)侍佛、邑子杜貴□(疑爲“賓”)侍佛、邑子杜阿來侍、邑子杜承敬、邑子王元□		

東面：

東面像主杜尚華、仰為亡父雍州主簿別駕咸陽太守奉朝請輕車將軍給事中雍州中□(應為“正”)又除□(應為“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杜洪暢、供養佛。東面象主假□□(應為“龍驤”)將軍資□□(應為“將”)軍杜文緯、為存亡父母、及合家大小、供養佛。邑子寧遠將軍京兆太守杜□陵、邑子開國侯杜景宗。塔主城局參軍杜□生、為存亡父母合門大小、供養佛。邑子鎮遠將軍頤川太守杜毛陵、邑子平南將軍洪驢(應為“鴻驢”)少卿杜顏奴、邑子河東郡功□(應為“曹”)杜夫扶

西面：

西面象主□(應為“御”)仗左右□(應為“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前陽翟令杜魯清、妻太元(應為“原”)王、息(應為“媳”)景和、□□(疑為“伯周”)嵩、□(疑為“叔”)慶、多侯、并合眷十八人、供養佛。邑女黃桃枝侍佛、邑女張曠房侍佛、邑女尹小矩侍佛、邑女新興秦阿妃侍佛、邑女南陽張房憐侍佛、邑女南陽趙汝勝侍佛時、邑女倪勝光侍佛時、邑女李照堂侍佛時。邑女黃鳳皇。邑子杜莫道、邑子杜尖興、邑主杜慶遵、都雄那(應為“都維那”)杜英□、邑子杜敬蘭、邑忠□(應為“中正”)杜容徽、□□(疑為“中正”或“邑子”)杜□敬、邑子杜清雀、忠□(應為“中正”)杜遺國、都邑主杜文□、邑子杜思顯、雄那(應為“維那”)杜慶□、邑子杜興國、邑子杜始和、邑子杜子遊。

